

舒城九里墩墓年代与国别考

张志鹏

(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南阳 473061)

内容提要 :舒城九里墩墓中出土有一批战国早期青铜器物,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45年之后。墓中所出的青铜礼器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征,墓主人应为战国早期楚国贵族,今舒城可能为其封地,墓中虽亦出蔡、钟离二国器物,但此二国距舒城甚远、时代亦不符,可能为楚灭蔡、钟离二国后所得战利品。

关键词 :舒城九里墩墓 年代 国别

中图分类号 :K871.41

文献标识码 :A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于1980年发现,出土器物十分丰富,但因早年两次被盗,再加上出土的青铜戟和铜鼓座铭文残损,造成对该墓研究的极大困难。发掘报告认为,墓主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君主,属春秋末期^[1]。杨德标先生通过将九里墩墓与多座蔡墓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九里墩墓是春秋末期的蔡侯墓,并以此为基础联系墓中出土的蔡侯戟,进一步判定墓主是蔡成侯朔^[2]。而徐少华先生通过详细分析墓中残存青铜器的年代,指出该墓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并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墓主为群舒之君的看法提出质疑,指出墓主可能为吴国高级贵族^[3]。然而这些观点都存在有待商榷的地方,不能令人信服。随着学者对该墓出土铜器铭文释读的深入以及相关考古、金文资料的发现和史实认识的深化,现在已经可以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可信的判断。

在九里墩墓残存的青铜器中,有两件有铭铜器值得注意。一件有铭铜戟,铭文为:蔡侯□之用戟。由于器物断裂,铭文中第三字的释读,学者意见不一。后来李治益先生目验原器释为朔^[4],已成定论。蔡侯朔即蔡成侯朔,公元前490年至前472年在位,据此可以断定该墓下葬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490年。

与蔡侯朔戟同出的有铭铜鼓座,由于字迹浮浅,锈蚀严重,大部分模糊不清,缺笔太多,全铭难以通读^[5]。先后有殷滌非^[6]、曹锦炎^[7]、何琳

仪^[8]诸位先生对该铭进行释读,今参考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将铭文隶定如下:

唯正月初吉庚午,余敖厥于之玄孙童鹿公叙,择其吉金,玄鏹纯吕,自作 鼓。命从若敦,远淑闻于王东吴谷,迎[于]徐人、陈[人],去蔡于寺,其神其臭 以支野于陈山之下,余持可参 其 鼓苾苾,乃于之雩,永祀是躬,俳公获飞龙曰夜白,余以共旒示 嫡庶子,余以会同姓九礼,以飶大夫、朋友,余以 于东土,至于淮之上。世万子孙永保。

铜鼓座铭文中的童鹿二字,过去一直不明所指。由于学者对铜鼓座铭文的重新释读和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凤阳卞庄一号墓的发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得到解决。

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发掘的安徽蚌埠市淮上区双墩一号墓,随葬器物十分丰富,其中有同铭铜钟9件,铭文为:唯王正月初吉丁亥,童麗君柏作其行钟。童麗之金。同铭簠2件,铭文为:唯正月初吉丁亥,童麗君柏择其吉金作其飶匱。有铭戟1件,铭文为:童鹿公柏之用戟。^[9]

2007年5月发掘的安徽凤阳卞庄一号墓出土同铭铜钟5件,铭文为:惟王正月初吉丁亥,余敖厥于之孙、童麗君柏之季子康,择其吉金,自作和钟之鈹,穆穆和和,柏之季康是良,以从我师行,以乐我父兄,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是尚。^[10]

收稿日期 2011-05-31

作者简介 张志鹏(1978-),男,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历史与文物考古研究。

结合安徽凤阳有钟离国古城遗址及钟离国古城遗址内出土的汉代钟离丞印封泥,可以肯定童麗即钟离。钟离国为嬴姓,以国为氏称钟离氏,有别于以楚钟离邑为氏的子姓钟离氏^[11]。钟离国旧居在今山东枣庄峄城,后迁于州来之西,再迁至今安徽凤阳、蚌埠市一带,后成为吴的属国,最终在公元前447年至前445年之间灭于楚,其地入楚,置钟离县^[12]。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和凤阳卞庄一号墓出土有铭钟离诸器无疑均应为位于今安徽凤阳、蚌埠市一带的钟离国所有。从钟离诸器显示的钟离国世系[敖厥于→柏(子)→康(孙)→□(曾孙)→叙(玄孙)]来看,童鹿公叙铜鼓座也为位于今安徽凤阳、蚌埠市一带的钟离国所有。童鹿公叙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即位^[13],结合钟离国灭亡时间来看,钟离国之亡应在童鹿公叙的继任者在位时期。另外,从铭文内容分析,童鹿公叙铜鼓座不应为助葬之物。因此,童鹿公叙铜鼓座应为楚灭钟离国的战利品。

墓中出土的蔡侯朔铜戟应与同出的钟离公叙铜鼓座一样,为战争掠夺品。这一看法也可以由同墓所出的部分铜器得到说明。杨德标先生通过将九里墩墓与多座蔡侯墓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两者所出部分铜器相似甚至相同^[14]。这应该是由于九里墩墓中的这部分器物与蔡侯朔戟一样,本来就是蔡器,是楚灭蔡后从蔡国掠夺而来。

这样来看,九里墩墓的下葬年代应为公元前445年之后的战国早期。这与根据蔡侯朔戟铭文断定该墓的下葬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490年是一致的,也与墓中残存的部分青铜器物(如:4件戈、1件殳)呈现战国早期的特征相符。

从公元前447年到前445年,蔡、钟离、杞三国相继灭于楚,九里墩墓中又同出蔡、钟离二国器物,并且墓葬所在的地域在公元前473年吴亡之后一直被楚国占据,因此墓主应该为灭亡三国的楚国统军将领。徐少华先生曾指出墓中残存的鼎、簠、敦等部分青铜礼器,不管是器物组合,还是形制、纹饰,都具有比较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和时代特征,说明该墓主人与楚国和楚文化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至受到楚文化的较多影响和浸染。^[15]现在这种现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墓主为楚国贵族,随葬铜器中自然会有部分楚器,其具有比较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和时代特征也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墓中出土蔡成侯朔戟、童鹿公叙鼓座,

但九里墩墓不可能为两人中任何一人的墓葬。公元前493年,蔡迁州来,即今安徽凤台、寿县一带。九里墩墓所在地(今安徽舒城)距公元前493年之后的蔡都古州来甚远,并且包括今安徽舒城在内的淮河中游和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应该在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后多被吴国占据,公元前473年吴亡后属楚。而于公元前472年去世的蔡成侯朔,不可能等到公元前447年蔡灭亡之后的公元前445年之后才下葬,并且远葬于其宿敌楚国境内。另外,九里墩墓主头向东,与蔡国墓葬墓主头向北相异。对此,徐少华先生已经提及^[16]。

同样地,从墓葬所处地域以及下葬时间来看,舒城九里墩墓也不可能为位于今安徽凤阳、蚌埠市一带的钟离国君主童鹿公叙的墓葬。此外,从墓葬形制来看,九里墩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蚌埠双墩一号、凤阳卞庄一号两座钟离国墓为圆形土坑竖穴墓,两者显然相异,不可能为同一国的墓葬。

徐少华先生认为墓主可能为吴国高级贵族,这应是对钟离国有关史实认识有误所致。位于今安徽凤阳、蚌埠市一带的钟离国早在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吴始伐楚之前已经是吴的属国,直到公元前473年吴亡^[17]。因此,不存在公元前490年之后吴攻伐钟离国的可能,钟离公叙铜鼓座也绝无可能是吴国所获战利品。另外,墓中残存的百余件青铜器物中也没有表现出吴文化特征,倘若九里墩墓为吴国高级贵族的墓葬,墓中却没有随葬吴器,这显然是无法解释的。

至于发掘报告认为墓主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君主,是由于错误地释读铜鼓座铭文“余敖厥于之玄孙童鹿公叙”中之“余”字为“舒”所致,可勿论。

综上所述,九里墩墓为战国早期楚国贵族墓葬。今安徽舒城大概是墓主的封地,死后遂葬于此。

[1]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2][14]杨德标:《舒城九里墩墓主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150页。

[3][15][16]徐少华:《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析论》,《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

[4]李治益:《蔡侯戟铭文补正》,《文物》2000年第8期。

- [5]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上圈铭文见图六、下圈铭文见图七。
- [6]殷滌非:《舒城九里墩墓的青铜鼓座》,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83年,第441~460页;殷滌非:《九里墩的青铜鼓座》,《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27~43页。
- [7]曹锦炎:《舒城九里墩鼓座铭文补释》,中国文字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字》新17辑(台湾)中国文字社1993年,第283~288页。
- [8]何琳仪:《九里墩鼓座铭文新释》,《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8年。
- [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
- [1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凤阳大东关与卞庄》,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4~83页。
- [11]张志鹏:《钟离氏族姓考》,《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2期。
- [12][13][17]张志鹏:《<春秋>经传所见钟离为三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5期,第75~77、83页。

(责任编辑 张平凤)

An Analysis of the Time and State Origin of the Tomb at Jiulidun, Shucheng

ZHANG Zhi-peng

(Research Centre of Han Dynasty Culture, Nanyang Teachers College, Nanyang, Henan 473061)

Abstract: A batch of bronze objects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were unearthed from a tomb at Jiulidun, Shucheng, Anhui provinc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burial time was around 445 BC. The bronze ritual objects from this tomb contain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u culture,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owner was likely to be a noble man of Chu of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time and the area of today's Shucheng might be his manor. The tomb also unearthed some objects belonging to the Cai and Zhongli states, which could be the spoils taken by the Chu armies when conquering Cai and Zhongli.

Key words: the tomb at Jiulidun, Shucheng; age; state origin

启事

为了更好地为广大专家学者服务,提高本刊的学术质量和编校水平,减少差错,本刊已从2011年第5期始,增加作者自校清样的流程,即稿件经审稿、编辑、排版、一至三校后,在互校的同时将清样以PDF格式发作者本人自校,以纠正专业表述等方面的错误或不妥之处(请勿删改或另增内容,以免影响版面、延误刊期)。请各位专家学者在赐稿的同时,提供快捷有效的联系方式(如手机号码和邮箱地址),以便及时联系。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本刊编辑部
2012年4月26日